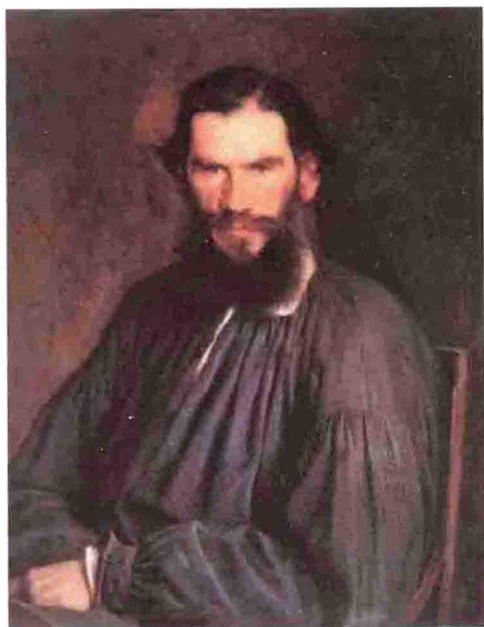


跨越国界的
托尔斯泰



Transnational
Tolstoy

【美】约翰·伯特·福斯特 John Burt Foster, Jr. 著 / 赵砾坚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World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跨越国界的
托尔斯泰
Transnational
Tolstoy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World

【美】约翰·伯特·福斯特 John Burt Foster, Jr. 著
赵砾坚 译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 / (美) 福斯特 (Foster, J.B.) 著 ;
赵砾坚译 . — 哈尔滨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2014.11
ISBN 978-7-5316-7893-9

I. ①跨… II. ①福… ②赵… III. ①托尔斯泰 ,
L.N. (1828~1910) — 小说研究 IV. ① 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9158 号

TRANSNATIONAL TOLSTOY :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World

Copyright©John Burt Foster, Jr., 2013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5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ress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

KUAYUE GUOJIE DE TUOERSITAI

作 者 [美] 约翰·伯特·福斯特 (John Burt Foster, Jr.) 著

译 者 赵砾坚 译

选题策划 杨 静

责任编辑 宋舒白 杨 静

装帧设计 苏静宇

责任校对 徐领娣

营销推广 曹树欢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7893-9

定 价 58.00元

版 权 登 记 08-2014-034

导 言

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和新比较主义

近二十年来，跨越国界已经成了一个推动文学，特别是故事和小说的跨文化观点的口号和关键概念。然而以前由于语言不同、文化传统和爱国情绪而产生的局限，评论家及学者多集中在文学的本国背景。现在，对文学的欣赏已全面深化，文学作品已进入了跨疆界发生的文化转折中。好在我们可以正常地观察别的媒体是怎样产生此类有国际甚至全球影响的、通常是较广泛普及的艺术形式，如电影和音乐，还有新媒体。虽然据文学当前的形态，这是一种旧的、地方性的、局域的媒体，知名作家和作品也经历相同程序吗？

实际上，即使在19世纪，当文学和文学研究变得仅局限于本国甚至被认为仅是民族性质时，在这新形成的比较文学领域里，学者们已在问这个问题了。然而基于当时的形势，这种比较态度是很弱、很有限的。它缺乏这一时期的国民态度所接受的广泛支持。而这是一个印刷文化和阅读能力对民族—国家都至关重要的时期。老的比较文学发源于欧洲，焦点在邻近国家的文学，而不是世界范围的写作和口头表达。结果这一词的选择变成了“国

际”，在欧洲主导的时代意味着仅以这一地区国家间的文学交流研究为前提。确实，在实践中，比较学术在当时以至20世纪很晚之后常常只关注法、英和德国的“主要”文学，再加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品和远古的圣经。这种典型的、在当时有启蒙意义善意的国际主义，体现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克服英国岛国偏狭的努力上。他坚持一种更广泛、更具求知欲的欧洲意识（对阿诺德来说，在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之前，意味着对法德发展保持同等的兴趣），他的定义是“以智力和精神的目标，建立一个伟大的同盟……其成员……包括希腊、罗马及东方古典知识和相互间的了解”。^①这里所提的“同盟”透露了一种假定，即每一个组成国都特征鲜明，这是阿诺德国际主义态度的明显标志。

相比之下，超国界转向了我们今天居住的更大、文化更多样的新民族世界，它有着对欧洲之外更广大区域文化的认识以及超国界的更高层交流——总之，一个曾是后殖民、全球化并且常是多语种的世界。在《比较文学的挑战》中，美籍西班牙比较学者克劳迪欧·奎林（Claudio Guillén）对这一领域超前的概述，已开始向这个方向转移。他的书是根据他在西班牙和中国的讲学而写的。这两个国家的跨文化研究都严重受阻，直接排斥国际态度。奎林强调，学术要寻求超出本国丰富文化的文学绝对公正，“出发点不是本国文学，也不是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②相反，基本动力应该来自对超越本国文学观的“渴望”，他以塞万提斯为例，着重说：“眼光只看到本国圈子的伟大作家是少见的。”^③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奎林来说，在他领域转向的相对

① 马修·阿诺德，《当代批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266页。

② 克劳迪欧·奎林，《比较文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3页。该书的西班牙语原文出版于1985年，英语版为1993年。

③ 同上，4页、9页。

早期，首选的词是“超民族”，一个比超国界含义更高远、更宁静但都市化的词。

从那时起，超国界便占了决定性的地位。^①如果“inter”的意思是指界限分明的国家间给一拿的近乎外交的规则性程序，那么“trans”是指更活跃、少常规甚至不可预见的跨边界冲动创造力，而这边界似乎不再有严格划定的界线。面临我们这世界更大、更多样化的感觉，一个新的比较主义诞生了。它的出现，共同帮助了转变比较文学研究，同时也为此书对托尔斯泰小说写作生涯跨越国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

对跨越国界的明晰关注产生于文学理论引起的争论。即20世纪60年代到至少80年代晚期与比较文学相连的所谓“理论岁月”。然而理论伴随产生它的智慧力和老练而来的激动，基本面向欧洲。确实，它可以（以它稀有的光辉，很具讽刺）被看作是马修·阿诺德对加深理解法德文化和关心智力发展的一种世纪性继续。这一盲点在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和伽亚特里·斯比维克（Gayatri Spivak）这样人物的后期作品中更耀眼地凸显。斯比维克与主导理论家如福柯（Foucault）和德里达（Derrida）建立联系。然而在像赛义德（Said）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或斯比维克翻译的孟加拉作家马哈斯维塔·德维（Mahasweta Devi）的故事中——开头是《其他世界》（*Other Worlds*）（1987），接着是《想象的地图》（*Imaginary Maps*）（1995）——，他们都呼吁以基本后殖民态度对欧洲之外的文学加以探索关注。第二个未被广泛认可的，对这超国界转换产生的推动力（奎林的兴趣所在），是探索甚至在文艺理论优势之前东亚和西欧文学间

^① 例如，美国比较文学学会2007年举办了多人参加的题为“跨，泛，际：联系中的文化”的会议。

的联系、平行和差异的东—西方研究。

然而另一个催化剂是翻译研究。它加深了对多样性、复杂性和不同语言文化交流意义的兴趣。这些见解早期在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运用产生于伊特玛·艾文—佐哈尔 (Itamar Eva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 他认为当一种文化进入第二种文化时会增添新意思,^①这一观点引起了注意。在这一转型进程中, 前缀“trans-”可能在比较研究中起到一个新的更精确的作用, 正如新近艾米莉·阿普塔 (Emily Apter) 在具有争议性的《翻译带: 一种新的比较文学》(*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06) 中阐明的。一个关键的副作用是翻译学减缓了比较学术必须一律以母语原文进行研究的要求。假如没有可供广泛阅读的自由, 比较者又意识到翻译作品伴随的多语种困难, 那么赛义德、斯比维克和东—西方研究提倡的对整个世界超国界的广阔开放感将全然不可能。

最近, 在与超出西方作品之外的课程和选读有关的时期, 对歌德有关世界文学零散评论的再生兴趣更直接加强了对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超国界范畴研究的价值。从翻译研究中, 大卫·达姆罗什 (David Damrosch) 强调这种作家的声誉取决于跨边界交流的跌宕起伏。其结果是本国背景中被忽略甚至被抹杀了的新的重要意义可能重现, 尽管原文和作家的直接文化背景明显受到局限而未受到充分重视。达姆罗什解决这难题的方法是力主作品以民族为圆心讲述的喻义应有充分的椭圆形影响为支撑。这补充的第二焦点使在相同作品基础上超国界的理解能在某些方面与国内背景所激发的方面有合法差异。“世界文学,” 达姆罗什论道, “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②法国学者帕

① 参照伊特玛·艾文—佐哈尔, 《多元系统研究》(*Polysystem Studies*)。

② 参照大卫·达姆罗什, 《足够的世界和时间》(*World Enough and Time*), 281页。

斯卡尔·卡萨诺瓦 (Pascale Casanova) 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2004) 又相应地说明了我们基于世界著名经典的所谓世界文学有赖于超国界验证特别中心的权威。然而即使她着重巴黎在验证从文艺复兴到直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此类名著中的作用, 她也允许了之后世界文学系统新中心的产生以及边缘成就的结晶。至于后者的例子, 她引用了卡夫卡 (Kafka) 的布拉格及叶芝、乔伊斯和贝克特的爱尔兰, 但她的观点也同样适应超国界范围的托尔斯泰的俄国——她的广为讨论的书中未提及的议题。

与此探究同样相关的是弗兰克·莫莱蒂关于小说作为流派的研究, 特别是在他宏大的编辑选集《小说》^①一书中, 在《历史、地理和文化》一卷最后一部分中所展开的观点。他指出, 小说现在可能在创造属于全世界的第一文学的进程中。毋庸置疑, 此书和莫莱蒂别的作品中显示的对这一流派的欧洲发源地及波及中心之外的丰富细节陈述, 可能被理解为显示对老比较文学欧洲基地国际主义的继续依附。然而在惊人的一节《“叙述”领域的语义学》中, 《小说》阐述了鲜明的别处地域, 例如东亚, 阿拉伯世界, 或(研究托尔斯泰特殊兴趣的) 俄国繁荣兴起的叙述传统。^②基于这常常隐蔽又具惊人力量的传统, 随着它的继续发展, 它们可能对世界小说发生影响, 未来将会产生比莫莱蒂主要的过去欧洲实例更复杂的交叉文化转换。

不足为奇, 以上对超国界转化的描述引起了争议。它与本国文学研究明显的区别无须赘述, 只需注意一点, 即本国众多领域的研究已不断显示对本

① 参照弗兰克·莫莱蒂,《朝向世界文学》(*Toward World Literature*),《小说》(*The Novel*), 1部, 703—756页。

② 参照莫莱蒂,《小说》(*The Novel*), 1部, 217—288页。这一段激发了新近对在法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出版的相同原则论文的搜集。参照《小说与文学》(*Fiction et Cultures*), 弗朗索瓦·拉法凯特和安娜·杜普莱特(编辑)。

身就是超国界和超语际的交叉—文化交流形式的兴趣。^①然而比较文学内部对新的超国界比较学存在激烈争论，争论的议题是如何依存或学习这一领域与欧洲文学关系的以往经历。翻译和后殖民研究，或为推动超国界转换做出如此贡献的世界文学的复苏，果真还与曾实践过的比较文学有着残存关系吗？争论一方的代表是十年前苏珊·巴斯内特的态度。她认为比较文学已经死亡，已被翻译学所取代。^②爱德华·赛义德对承认继承表现出了极大热忱，因为尽管他对后殖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仍不断地表达了对老比较文学里程碑的强烈兴趣，这就是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Mimesis*）。^③然而赛义德非常谨慎地区分奥尔巴赫地域题材的局限和他方法的价值，他的方法对在别的场合下会走得很远的历史文化多样性采取包容态度。也许正如预料中的，莫莱蒂对奥尔巴赫（Auerbach）的崇拜更甚。而斯比维克（Spivak）对文化的复杂性有着谨慎的认知，当她将自己的作品成双地延伸到欧洲之外时，她坦诚地告诫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她基本上也是一个欧洲主义者。从另一个角度看，最近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发起的，对东中欧文学研究中“国际的”和“欧洲的”的提法可能会显得支持老模式。然而出自马塞尔·考尼斯—蒲柏（Marcel Cornis-Pope）和约翰·纽堡尔（John Neubauer）之手的这一合作项目竟成了超国界学术的范例，因为它突出了转换的边缘，文化的巨变和区域间隐蔽的相同，其中民族主义正如奎林所说的西班牙和中国的情况一样，是一个问题。^④

① 特别参照苏珊·斯坦福·福里德曼，《移民，流散与边界》（*Migrations, Diasporas, and Borders*）。

② 参照苏珊·巴斯内特，《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Translation Studies*）。

③ 参照比如卡津《摹仿》中的“第50周年纪念版导言”（*Introduction to the Fiftieth-anniversary Edition*）。

④ 参照《东中欧文学文化史：19世纪、20世纪的接合与分离》（*History of the Literary Cultures of East-Central Europe: Junctions and Disjunction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马塞尔·考尼斯—蒲柏和约翰·纽堡尔编辑整理，4部。

面临这些和其他多边纷争的情势，我们只有假定当比较文学中的“比较”象征的是支配一切、持续进化的兴趣时，其中的差异才有意义，这兴趣是交叉文化的变化和交流，可以增强文学研究的兴趣。因此比较的含义就是接受挑战，去研究在意义深远的语言、历史和/或社会方式互异的环境下产生的作品、创作生涯、流派和文学背景。从此优势点我们可以看到，后殖民性、世界文学和翻译学，各个名称均是二十年以来比较文学研究中跨国界态度的发展阶段。1900年左右，如日中天的欧洲诸帝国现已被众多广大的后继国家所取代，世界有记载的写作已伸延到更远大的空间并回溯超出帝国时期，对翻译的提高和尊重意识使我们对一切文学和文化异同的见解敏锐起来。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也包括别的主要兴趣，如文艺理论和诗学、媒体学和其他艺术以及跨学科研究。可是这些科目都采用作为媒体的文学鲜明性，无论是以自身的权利，与其他艺术和学科语言的关系，或全部的媒体内部。至于新比较主义，跨越国界表示一种扩大了语境，一种追求横贯语言、文化和民族文学的世界范畴观点。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宏愿潜藏于旧领域基于欧洲方面的国际性中。现在，由于后殖民和翻译研究和之后对世界文学更新的兴趣，跨越国界性已经拥有了更清晰、定义更明确的轮廓用以拓宽文学研究的地缘文化范畴。本书将探讨这更广视野的蕴涵，分析系列实例来显示跨越国界的转换可以怎样丰富我们对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作家成就的欣赏。

托尔斯泰是广受喜爱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汲取阿诺德（Arnold）援引的欧洲文学领域的意义，他最终在卡萨诺瓦（Casanova）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中得到长久的承认，但他却预见了后殖民研究和世界文学运动的广阔天

地。虽然近期的文选读本几乎无一提及这一词汇，^①他也发展了与歌德相匹配的世界文学思想。为掌握他们价值的细节发展，《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介乎西方与世界之间》展现了一套始于19世纪的德、法和意大利的交叉文化系列实例分析，旨在唤起对托尔斯泰与他那个时代的西方文学相连的新认识；然后进入对他主要作品与新兴现代主义小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亲缘与联系的粗略研究，最后转向阐明他在20世纪继而新千年世界文学观点成长中的作用。此书以名副其实的跨越国界，将着重谈论托尔斯泰前期创作的两部在俄国之外读者群中享有最持久声誉的著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两部世界最感人的小说。

为了给予作家写作生涯后半期应有的预期声誉，《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也将特别论及《哈吉·穆拉德》^②，一部托尔斯泰1910年辞世后在他的纸堆中发现的、于1912年发表的较短小说。它同享早期作品的历史观，同享它们众多人物间微妙的相互关系，同时甚至超过其社会幅度。尽管读者的赞誉不一，像维特根斯坦和哈罗德·布鲁姆，但它仍应享有更多的荣誉。^③托尔斯泰将叙述才能运用于穆斯林（Muslim）主角，伴随于此的是他在两部小说巨著中对超出西方范围的写作——他所称的世界文学的不懈努力。他在写论著《什么是艺术？》时开始写作这部小说，那时他谈论了他宗旨的转变。他后期的几部短篇小说也同样展示了他的世界文学观以及如何实践的看法，最突

① 参照《世界文学：一个读者》（*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西奥·德哈恩，西塞尔·多明古斯和马兹·罗森代尔·托马森编辑整理。

② 为加强此小说的跨边界文化范畴，本人提到主角的名字以及此名在书题中显示的土耳其原名的盎格鲁化（Anglicized）名称，而不是俄国习惯发音的“d”向“t”的转化。

③ 维特根斯坦，参照诺曼·马尔科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回忆录》（*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45、58、95、97页。布鲁姆，参照哈罗德·布鲁姆，《托尔斯泰与英雄主义》（*Tolstoy and Heroism*）。

出的是《高加索的囚徒》、《伊凡·伊利奇之死》和《主与仆》。

关于作者创作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压缩托尔斯泰的大宗学术见解，或完全无视他早期作品的交叉文化处理。他超国界的观点一直是散见或隐现着的：当我们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哈吉·穆拉德》与西方关键时刻相连、后又与世界文学相连时，当托尔斯泰回答某些关键前辈时，当后继者怀着多样的兴趣回顾他时，当他自己的小说目标经历着主要变化时。此书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托尔斯泰研究的平衡，至少它希望能更综合地表现跨越国界的态度会为文学研究增添些什么。

第一部分谈及托尔斯泰和19世纪小说，其宗旨有二。第一和第四章分析了在托尔斯泰写作前半期西方和世界产生的问题，第二和第三章重新估价并延伸到一个新领域，即他与司汤达和福楼拜的联系。这是那个世纪当法国设立跨越国界标准时，托尔斯泰最常被用来参照的两位杰出的法国小说家。

第一章提出了西方主义的问题，它指西方以外的作家和思想家对西方的批评和负面定见。^①这是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有关他们国家的文化认证应放在何处的传统争论，当时知识阶层广泛意识的反应是：尽管俄国的形象是欧洲的强力，它却未能完全归属西方。本章的着眼点是文学性的，也即挑选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俄国19世纪60年代西方化改革之后，小说中出现的对西欧的反应。焦点聚集在德国都市浴池地的旅行，以此作为现代象征；《安娜·卡列尼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赌徒》的意大利之旅作为西方文化源泉之一。俄国人物初次直接接触西方时所表现的多重

① 综观这广泛的概括，特别是它们引起的对西方的怀疑或指责，参照伊恩·布鲁马和阿维沙·玛格莉特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西方思想》（*Mind of the West*），4章，75—99页大部涉及俄国19世纪，但在处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方面，他采用直接阐述的说明而不是对他们叙事散文的复杂论据。

态度因其多样而更丰富，也对广泛的西方主义公式做了更深的探索，这种公式常是俄国人用已有的区别来回应西方的标志。总之，托尔斯泰对定见的惊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粗鲁但坦诚的生动态度构成鲜明对照，虽然两者都面临俄国文学面对面比照西方的复杂情况。

第四章充实这一章的是歌德《有择的亲和》中复杂的情节与人物驱动的世界文学见解——十年前于1830年左右他首创了“世界文学”一词——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相同暗示的比较。它在某种程度上牵涉与歌德的直接对话。两部作品都在探索与它们所属的风俗流派小说中不同世界的“世界”广义。然后本章转向普鲁斯特，他以在上世纪转折点因不常使用而渐弱了的世界性继续这一争议。但他这样做，有较少全球视野需要的自我意识，只因为法国人（确切地说是巴黎人）对文学中心有更含蓄的自信。在三部作品中，世界性（而不是世界文学）的诱惑在对人死亡的悲剧认识之前黯淡了。

第二、三章将托尔斯泰重要的、与法国联系的继承感带进一个新地段，超出常提及的《战争与和平》和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前部的滑铁卢章节的联系，或作为婚外情小说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关联。《修道院》中意大利主背景下支配一切的复仇情节连着托尔斯泰详尽的安娜出自圣经的“复仇在我”的碑铭。成败的关键在于法—俄文化关系和这些心理小说家解析在面临道德/宗教传统阻力时复仇冲动力表现的方式。司汤达的女主角吉娜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开场时像不同的一对，《巴马修道院》展现的是有意大利文化特点的生气勃勃的复仇，而安娜的碑铭却宣称是上帝而不是人，在报应来临时将“偿还”。然而在结尾时，一个逆转却表明了作家无情的写作会怎样检验他的原始计划。司汤达应允了宗教苦行，托尔斯泰的复仇动机始终有力，保持了双方作家的联系。

《情感教育》，福楼拜有关当代法国社会的第二部巨著，也与《战争与和平》有同样启发性关联。尽管两部小说处理的是显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几乎同时写于19世纪60年代。拿破仑（Napoleon）庆典在两部小说中的关键作用像一个透镜，细审了历史伟人和伟大转折时刻的意义。福楼拜小说直抵拿破仑三世1852年12月2日的政变。而第一部托尔斯泰小说独立出版的版本，出自作者对过去更深层的挖掘，作为当代俄国的前奏。它的追溯超出1812年的胜利和1805年的失败之外，恰恰是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加冕礼一年之后。托尔斯泰和福楼拜都很欣赏对方文学中为本国小说家所不齿的当代小说。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之于福楼拜，屠格涅夫（Turgenev）的《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之于托尔斯泰，虽然这很富讽意，但拿破仑庆典在两部小说中都未能激发对历史光辉的纪念。相反，它们点燃了胜利的阴暗面和拿破仑历史观的徒劳无益。

第二部分论及何以托尔斯泰在20世纪西方小说的地位超越苏联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谈及他与文学现实主义的联系，不时强调追溯的与福楼拜和司汤达的历史关联。上世纪托尔斯泰曾被看作是从现代发明掉队的老式小说家。这种看法得到苏联政策的鼓励并将他列为“批判现实主义”，但他的作品也受到英国的赞赏。^①不过这情况实际上复杂得多，这在第二部将有实例说明。

头两章主要涉及被忽略的托尔斯泰与更具现代倾向的小说的一致。第五章论及20世纪初《安娜·卡列尼娜》更具影响力的两个英语译本，重新对比

^① 特别参照捷尔吉·卢卡奇，《欧洲现实主义研究》（*Studies in European Realism*），《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的发展》（*Tolsto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alism*）126—205页，《列夫·托尔斯泰和西欧文学》（*Leo Tolstoy and Western European Literature*）242—264页，艾利斯·默多克的论文《反枯燥》（*Against Dryness*）。

对此作品分类时使用的小说“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模式。在英语文化中，这正是从康拉德到乔伊斯的现代主义运动崭露头角之际，这些词汇也还未理所当然地达到目前文学用语的那种严谨。同时，在俄国源文化中，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几十年后写了《什么是艺术？》，他在书中对当时存在于大陆的现实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进行了激烈评论。结果，这些先在托尔斯泰的俄语，后在英语翻译中运用的关键词表现了惊人的但具启蒙作用的流动性，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文化论战作为口号突出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对抗中。

第六章通过突出他的生动描绘和与关键的所谓现代主义倾向的意象主义亲缘关系来深化对托尔斯泰所称的现实主义质问。这便是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关于托尔斯泰的不同意见，建立在他自己的超国界接触和对20世纪早期文学参与的基础上。纳巴科夫在西欧住过，之后来到美国，用俄语写作后又有过短暂的法语写作，最后转向英语。他辩护说托尔斯泰与西方小说的创造性相关（与福楼拜紧密相连），这种创造性助长了生动具体的印象感，而取代了多种的抽象“思想”。

接下来的两章重温了对托尔斯泰文学现实主义者声誉必不可少的一个问题，即他的小说与同宗旨历史写作的重叠，但也将它引入了一个新领域。第七章对两部小说的看法是，虽然它们集中于19世纪60年代西欧老一代或近一战时期的关键转折点，它们仍超前联系着法西斯与二战时期民族主义的危机。以当时的形势来看，《豹》中的朱塞佩·迪·兰佩杜萨和《阿尔腾堡的胡桃树》中的安德烈·马尔罗都回应着《巴马修道院》和《战争与和平》中的民族团结景观。结果是，这两部20世纪小说虽然与现代小说主流有些距离，却强调了托尔斯泰着重超国界意义的历史联系，而这正是《战争与和

平》对于国土的强烈爱国感时期，这便提供了19世纪拿破仑和现代希特勒（Hitler）入侵的平行对照。

第八章继续探讨历史的压力是如何在小说作品中得以体验的，它不是以成熟的叙述形式，而是人体内心感受的经历和获取与作品外界材料相连时更广的参与。基于埃里克·奥尔巴赫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它审视了司汤达、福楼拜和托尔斯泰以及托马斯·曼作品中“感受的历史”的主题。然后本章谈论了这种联系历史的压力和人体紧张感的写作是如何在更神秘和怪异色彩的20世纪后期魔幻现实主义中出现的。这种转变在D.M.托马斯（D.M.Thomas）的《白旅馆》（*The White Hotel*, 1981）中尤为惊人，他回顾第七章谈及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危机。然而相同主题的新扭曲发生在当时有名的20世纪50年代左右被理解为西方文学系统的边缘小说中，例如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1967）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夜半儿童》（*Midnight's Childre*n, 1981）。尽管他们与早期的主题形成直接关联，托尔斯泰和他之后的托马斯·曼也与后期的发展有关。

因与魔幻现实主义相连而拓宽了的文学天地展望了第三部分对托尔斯泰和世界文学实例的研究，着重于《哈吉·穆拉德》。为拓展第四章谈起的这世界文学开端的兴趣，第三部分先回顾了一个误解苏联解体后托尔斯泰超国界主义意义的批评辩论。第十章回放和细审了19世纪90年代托尔斯泰自己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两者均在《什么是艺术？》中勾勒了轮廓，并在他《安娜·卡列尼娜》之后的小说中得以实行。第十一章接着讨论印度和埃及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对小说中托尔斯泰的一些反馈。第十二章对《哈吉·穆拉德》做了详解，集中于这部短篇小说中托尔斯泰对文化差异的处理，这或

许被认作是他关于世界文学最自觉最充实的作品。

为探讨托尔斯泰在西方之外的影响，第九章对20世纪90年代的北美文化论战提出了新见解。这论战起源于索尔·贝娄（Saul Bellow）提出的概念模糊而几近口号的“祖鲁托尔斯泰”，其纷争认为这一提法是西方文化沙文主义的表征。以至这场辩论卷入了托尔斯泰，但也暴露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模糊概念，即他的作品在苏联之后早期跨越国界的世界内的归属。既强调托尔斯泰在西方“名著”作品中的经典地位，却又无视与后殖民或第三世界可能的联系，这便显示了批评家们讽刺性的盲目，因为他们的争论无非是为了更大的文化多样性。同时也透露了托尔斯泰作品的无知，它们表现的是他对自己所提及的世界文学并未充分地认真阅读。

第十章回顾一世纪前，估量托尔斯泰《哈吉·穆拉德》世界观众的范畴。在他动笔这部小说时，他也写完了专著《什么是艺术？》，其中他提出了“全球”或“全世界”文学的思想。这一论题的思想在他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意思？这篇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理想？托尔斯泰的理论与实践关系是很复杂的，现在更复杂，由于《什么是艺术？》批驳了他包括备受喜爱的《高加索的囚徒》在内的几乎所有小说。这部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短篇小说不同于体现托尔斯泰作品中主要冲突的《哈吉·穆拉德》。第十章也分析了为什么这部短篇小说与另外两篇短篇小说共同被认为体现或典型化了作者的创作，那两篇是长故事《主与仆》和《伊凡·伊里奇之死》，后者常出现在近年的世界文学选读中。

第十一章探讨了普列姆昌德〔滕伯德·拉伊（Dhanpat Rai）的笔名〕和纳吉布·马福慈的托尔斯泰时刻，提供了托尔斯泰在西方之外影响的实例研究。两位作家都阅读了托尔斯泰的英译本，然而他们的兴